

# 试论列宁关于避免执政危险的思想

张 华<sup>1</sup>, 张 安<sup>2</sup>

(1.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1; 2.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政党执掌政权只有避免执政危险, 才能长久地确保执政地位。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列宁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避免执政危险的问题, 他深刻地认识到俄共(布)执政面临着急躁冒进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以及被俄国旧文化所征服的危险。列宁对如何避免这些执政危险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探索,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巩固了俄共(布)的执政地位。

**[关键词]** 列宁; 执政危险; 执政安全

**[中图分类号]** A821;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3-0036-07

## On Lenin's Thought about How to Avoid the Danger of Ruling

ZHANG Hua<sup>1</sup>, ZHANG An<sup>2</sup>

(1.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Marxism The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in power must avoid ruling dangers to ensure long-term ruling posit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enin had already started thinking about how to avoid the danger of ruling. He profoundly recognized that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was facing the danger of impetuosity, the danger of being isolated from the masses, the danger of insufficient ruling capacity and the danger of being conquered by the old Russian culture. Lenin conducted preliminary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on how to avoid these dangers and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s (Bolshevik) ruling position.

**Key words:** Lenin; ruling danger; ruling security

所谓执政危险, 就是政党在执政中面临的损害执政地位的各种威胁。一个政党若想要长久地执掌政权, 就必须避免执政危险, 维护执政安全, 确保执政地位的稳固。列宁在领导俄共(布)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 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 洞察了刚刚执掌政权的俄共(布)所面临的一系列执政危险, 并对如何避免这

些执政危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想法和观点。列宁关于避免执政危险的思考和实践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执政规律, 确保执政安全的开端, 蕴含着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一些基本要求, 对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 2016-03-07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列宁职业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14B074); 湖南省教育厅开放基金项目“高校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研究——以湖南科技职业学院‘321’联系制度为例”(15KB161)

作者简介: 张 华(1974-), 男, 湖南怀化人,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 安(1987-), 男, 湖南常德人,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一 执政党必须避免急躁冒进的危险

急躁冒进是无产阶级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种表现,其实质是对客观环境缺少调查,单凭主观热情进行实践的思想倾向。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对于刚刚执掌政权的俄共(布)来说极为有害,可能让俄共(布)再次丧失政权。因此,列宁强调:“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sup>[1]784-785</sup>

(一)必须在中心任务转变的过程中避免急躁冒进的危险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俄共(布)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列宁指出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处在有着某些曲折的、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期”<sup>[1]347</sup>。这种客观形势要求“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sup>[1]350</sup>然而,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存在急躁冒进的心理。在他们看来,世界革命的目标还未实现,俄共(布)的中心任务仍然是革命而非建设。他们明确提出不应该把党的精力放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现在这块残缺不全的领土上”,而应该“把任务同日益增长的国际革命运动联系起来。”<sup>[2]</sup>“左派共产主义者”还操纵被他们控制的莫斯科区域局,通过了不信任中央的分裂主义决议。该决议认为以世界革命为中心任务是不容置疑的。为了这样的中心任务,俄共(布)“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sup>[3]420</sup>列宁认为正如恩格斯在批判布朗基派所说的那样,“左派共产主义者”是“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sup>[4]</sup>,明明没有力量,没有军队,“偏要投入重大的起义冲突和军事冲突”,这种强行推行革命战略想法是一种“革命空谈病”。对于刚刚执掌政权的俄共(布)来说,“在这样的时候害这种病,就有断送革命的危险”,极有可能让俄共(布)失掉政权,再次成为秘密活动的革命党。列宁之所以力主签订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就是担心那种要与帝国主义硬拼、决一死战的急躁冒进的倾向断送苏维埃政权。同时,列宁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苏维埃政权的未来,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并不是流于形式,“它比历史上有过的政治机关要高得多”,“只要苏维埃政权不去冒险”,“把经济工作的任务放在首位”,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组建强大的

军队,就能抵制住国内外反动派,保证苏维埃政权稳固。因此,列宁告诫说:“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事实,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sup>[5]</sup>

(二)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避免急躁冒进的危险

美国学者伊萨克·斯坦伯格曾说,革命战争年代的凯歌行进、战天斗地的激情几乎让人们认为革命时代经验无所不能,似乎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也如同战争年代一样在疾风骤雨的运动中可以实现。<sup>[6]</sup>因而,很多人沾染到盲目乐观和骄傲自大的毛病,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和复杂性,鼓吹“童话式”的社会主义。列宁及时地从革命经验的迷信中清醒过来,认识到执政党应当采用和平工作的办法来代替暴力革命的方法。他指出,热情、强攻、英雄主义帮助我们完成了曾经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使我们取得了胜利,但在党已经转变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sup>[7]349</sup>列宁强调:“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sup>[1]612</sup>因此,主观地设想“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sup>[1]786</sup>

由于列宁的明确反对和批驳,“左派共产主义者”激进的世界革命主张始终未能在俄共(布)党内成为主流,俄共(布)成功实现了中心任务的转换。但是,列宁所担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危险,却在他逝世之后不断显现。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上就宣布苏联已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在10年内(即到1970年),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美国;而在20年内(即到1980年)苏联将“大体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时的苏联媒体普遍宣称“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种急躁冒进、盲目乐观的情绪固化了业已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导致苏共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改革,则是另外一种急躁冒进的形式。戈氏的改革团队迷信“制度决定论”,认为改革可以一步到位,在政治上直接引进西方式的多元政治,在经济上直接采取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休克

疗法,认为在一两年间建立西方式的体制,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正是这种急躁冒进的改革模式,直接导致了苏共的覆灭。<sup>[8]</sup>

## 二 执政党必须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

能够与群众紧密地联系起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天然优势。霍布斯鲍姆就曾指出:“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唯一的真正财产,在于能认识及把握群众的需要,并追随群众,进而领导群众。”<sup>[9]</sup>但是这种天然优势并不是万古不变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不能联系群众,表达人民的想法,整个国家机器就要散架。<sup>[10]</sup>因而,列宁强调执政党“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sup>[1]626</sup>，“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sup>[1]560</sup>

(一)通过保障人民群众政治权利来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暴动,推翻了旧有的政权,成为执政党,因而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一旦被执政党所独占或是不受监督与制约,就会导致执政党蜕化变质、脱离群众。在西方传统的政治学的理论中,使统一的国家权力由不同的分支机构行使,建立起相互制约的关系,是防止权力滥用和腐化的重要路径。孟德斯鸠就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sup>[11]</sup>但是这种思路并不是没有缺陷,如果没有民众的参与,各个分支的权力为了相互之间利益的最大化,可能将权力间制衡关系演化为一种利益的共谋关系。<sup>[12]</sup>列宁就没有完全按照权力制约的理论框架来解决执政党权力滥用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人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实现,通过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而又有效的政治权利来解决执政党的权力制约问题。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方面,列宁要求扩大监督机构的工农代表比例,把工农中的优秀分子选拔上来,进而“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sup>[1]780</sup>;同时列宁还探索了工会监督、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监督、信访监督等其他形式,充分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权的行使。在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权方面,列宁要求“利用执政的机会教会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懂得管理的一切细节。”<sup>[13]437</sup>列宁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保障,一方面收到了西方政治学中用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效果,另一方面也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使党和人民群众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更

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效地防范了执政党脱离群众危险的出现。

(二)通过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来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人民群众不可能像精英分子那样对主义和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他们的政治目的、战略和方法与精英分子差别很大。底层人民群众更多地关注与生存相关的物质利益,而不会顾及抽象的“主义”,不会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sup>[14]</sup>因此,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根本上来说还是利益上的联系。党群之间的离合程度最终取决于执政党对人民利益诉求的满足程度。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为了应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苏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非常规的方式调动和汲取社会资源,抵抗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确保了政权。但是政权稳定之后,俄共(布)并没有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干扰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当时,包括列宁在内很多人主张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酿成了1921年春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多起群众抗争性利益表达的事件。列宁坦承这时的政治危机表明党正面临着脱离“应由它率领前进的人民大多数,农民大多数的危险”。<sup>[1]699</sup>这种现实促使列宁意识到党群之间密切的联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一旦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仍然可能脱离群众,被群众所抛弃。因此,他总结道“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sup>[1]570</sup>,否则就会失败。列宁还指出,苏俄工农生活困苦的原因不仅在于频繁的战乱、落后的经济,更在于党内同志对于工农生活改善问题的忽视。因此,列宁强调要“把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的问题单独提出来”,“对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最确切、最完备和最及时的报告。”<sup>[15]</sup>在列宁的推动下,俄共(布)出台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切实保障了人民利益,密切了俄共(布)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了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列宁这一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开展根据地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积极争取、维护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财产权、健康权,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sup>[16]</sup>,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群众的支持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脱离群

众可以说是执政党最为致命的危险。可惜的是后来的苏共却沿着与列宁相反的思路越走越远,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实现苏联现代化和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展现出极大的优越性,但是苏共并没有根据新的形势对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造成了苏共权力高度集中,干部终身制盛行,竟然在党内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余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之多)<sup>[17]</sup>。特权阶层的存在损害了苏共在群众中形象,严重扭曲了党群关系,拉开了党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偏重投资积累,不注重社会消费,使苏联人民生活常年得不到改善,人民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满足。最终导致了人民对苏共执政的期待和信任减低。苏共解体前的一项“苏共代表谁的利益”的调查显示只有11%的民众认为苏共代表自身利益,85%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党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sup>[18]</sup>正是如此,我们看到苏联灭亡之时,苏联人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哀与痛苦,因为这个政党早已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甚至成为压迫他们的异己力量,抛弃它也就必然。

### 三 执政党必须避免能力不足的危险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列宁意识到俄共(布)在政治权力、政治动员方面的能力都是“足够的、绰绰有余的”,问题是缺少管理的本领,缺少经济建设的能力。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sup>[1]666</sup>列宁还警示道:“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sup>[13]115</sup>列宁不仅敏锐地察觉到俄共(布)面临着能力不足的危险,还对如何避免这一危险,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一)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来避免能力不足的危险

列宁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建设任务面前,执政党不能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要坦率地承认,我们还非常不善于经营管理,不善于当组织和管理者。”<sup>[1]107</sup>而要改变党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的问题,就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

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sup>[1]786</sup>列宁主张免去那些不认真学习知识的共产党员的职务。由于俄共(布)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糟糕透了,“低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因而,在列宁当时的语境中,学习对象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事物。列宁要求组织新中央委员学习资本主义管理国家的“一切细节”。当时西方资本社会出现了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的管理形式——泰罗制。列宁获悉之后,要求“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sup>[19]</sup>他还要求在国家公职人员认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科学、办公制度等行政管理的基础知识,并且要求他们通过相关的能力考试方可合格。除此之外,列宁还要求执政党必须“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sup>[13]436</sup>列宁还推动俄共(布)出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简称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十分重视这一计划,并将其看作“第二个党纲”。

(二)通过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来避免能力不足的危险

虽然当时俄共(布)党内文化水平低下,但旧时代遗留下了的各种人才,他们是各条战线上的内行和能手。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列宁形成了一个避免执政党能力不足危险的新的思路,那就是吸纳各行各业的内行专家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1921年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中特别提到国民教育部门(和机关)党员的能力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收和利用专家的程度,只有实现教育专家和党员领导者的合作,才能应对好教育发展中的各项问题,推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sup>[20]330</sup>为了能够让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才参加到国家建设的工作中来,列宁对他们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列宁认为:“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sup>[3]768</sup>。列宁十分重视各方面人才的意见,将其作为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的核心要素之一,认为“没有他们自始至终的参加,不得实行任何一项重大措施。”<sup>[20]326</sup>因此,列宁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吸收各类人才“担任地方的特别是中央的负责工作。”<sup>[20]411</sup>当时,苏俄聘任了不少知识分子担任国家机关的部门长官,如伊·尼·波里索夫担任副交通人民委员,美国康采恩公司的总工程师

师斯里姆尔曾担任苏联国家建筑委员会主席,机车制造专家米·瓦·罗蒙诺索夫担任机车采购委员会主任。在列宁的倡议和主导下,苏俄专家委员会得以成立,随后又成立了科学技术部,这两个机构都有由专家和知识分子组成,对政府的决策和规划能够提供直接的指导,有效地提升了俄共(布)的执政能力。

适应时代发展,提升能力素质,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也是保证党执政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列宁关于俄共(布)能力不足问题的思考是具有前瞻性的。后面的苏共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自居,缺乏顺应时代潮流的学习精神,整个领导集团暮气沉沉;同时苏共又对先进的知识精英不信任,导致了苏共在治国理政方面能力的严重不足,丧失了引领苏联社会向前发展的能力,从而无法应对复杂而突出的国内外矛盾。

#### 四 执政党必须避免被落后文化征服的危险

十月革命在政治上的成就是显著的,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政治组织,建立了新的苏维埃制度,但是俄国旧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sup>[1]784</sup>在幅员辽阔的俄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sup>[1]509</sup>因此,列宁认为俄国旧时代的思想残余是苏俄人民的最大的“敌人”,俄共(布)面临着被“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所征服的危险。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被征服者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他很是担忧文化“低得可怜”的俄共(布)也出现这种情形。列宁以莫斯科为例,警示“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sup>[21]</sup>

##### (一)必须避免党内官僚主义的“复活”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高层对官僚主义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警惕,“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认为新型的工农政权完全能够制止官僚主义的出现。但只过了一年,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会议上,全党不得不承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又将官僚主义称为党的一种病症。后面列宁进一步意识到,官僚主义并不只体现在个别党员身上,普通党员到高层领导都存在官僚主义的毛病。列宁不得不悲愤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

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sup>[13]93</sup>列宁不仅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还深刻地察觉:“在一个有着深厚农奴制传统影响的国度”,可以很直接地在政治上获得胜利,但“却无法‘赶走’、无法‘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减少它……其他办法,不是有意骗人就是出于幼稚。”<sup>[22]</sup>这说明,对于后发型的国家来说,官僚主义的文化基础和习惯心理是顽固的,必须时刻警惕官僚主义对执政党的侵袭,不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官僚主义必然隔绝,也不可妄想短时期内消除官僚主义,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

##### (二)必须避免党内形成“危害事业的奥勃洛摩夫习气”

“奥勃洛摩夫”原本是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一个小说人物形象,他懒惰成性、消极怠工、沉湎于幻想、因循守旧,因而毫无建树。奥勃洛摩夫的这些性格特点被称为“奥勃洛摩夫精神”,这是农奴制时代的文化遗迹,反映出俄国国民的某些劣根性。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国家各项管理工作的开展,列宁开始察觉到各人民委员部及其各部门实际上存在懒散拖拉和人浮于事的问题。他气愤地指出:“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sup>[13]12</sup>列宁进一步发现,奥勃洛摩夫习气不仅存在,还有蔓延的趋势。因而列宁警示全党“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如果不注意、不督促、不检查、不拿三根鞭子抽打”<sup>[7]383</sup>,工作在“两个星期就会‘松下来’”,“结果养成了危害事业的奥勃洛摩夫习气”。<sup>[7]389</sup>

##### (三)必须避免党内出现“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

苏联是由100多个民族构成的庞大联合体,再加之俄罗斯的建国史就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和不断征服其他民族的过程,民族矛盾古已有之,且十分尖锐。这样的历史传统“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sup>[23]</sup>但是,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覆灭而消失,反而在苏维埃政权中沿袭下来,一些党员干部“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sup>[1]756</sup>列宁认为这种习以为常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于苏维埃政权和团结和稳固是非常有害

的。由于以往沙俄的独裁和压迫已经使各民族对俄罗斯民族不信任和仇恨心理根深蒂固。如果执政党内还存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思想,必然会激化民族矛盾,引起执政危机。因此,列宁强调:“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sup>[1]101</sup>

文化观念对人思想的影响是十分顽固的,在短时间内难以清除,尤其是在已经渗透到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成为人们日常伦理的心理和习惯的情况下。可以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就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与她脱胎而出的宗法社会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残余斗争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俄罗斯传统宗法村社文化激烈冲突的历史。”<sup>[24]</sup>令人遗憾的是,这场冲突之中,俄罗斯传统宗法村社文化占据了上风,列宁关于俄共(布)会被古老俄罗斯习惯和观念所“征服”的担忧最终演变成现实。有学者就指出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在诸多方面已经远离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而是“有着俄国沙皇制度政治文化的历史背景”,可以看作是旧沙俄时代统治模式在现代条件下的“重演”。<sup>[25]</sup>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在苏联的民族关系中阴魂不散。苏联历史上伤害苏联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感情的事件不断出现,促使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独立意识的滋长。这种意识在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中找到了机会释放出来,从而成为导致苏联解体。<sup>[26]</sup>

## 五 余论

列宁直接领导俄共(布)执掌政权的时间并不长,再加之囿于苏维埃政权初创之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列宁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条件对执政危险的问题进行系统而又全面的理论建构。但列宁在思考和探索俄共(布)如何避免执政危险的短暂过程中所迸发出的一系列思想火花,却是发人深省、入木三分的。时间愈是弥久,愈能显现出它的价值与魅力。回望历史,我们已与列宁的那个时代相距近一个世纪,这期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曾经漫卷全球,无产阶级政党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但最终由盛转衰,陷入低潮,执掌政权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改旗易帜,尤其是苏联共产党这样的大党,也竟然在没有外敌直接入侵的情

况下,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对于苏共这样戏剧性的命运,人们在唏嘘、惊愕和惋惜之余也纷纷从各个角度缘波讨源,寻踪觅迹,以求解答这一剧变背后的真实原因。因此,关于苏共亡党的研究早已是千家注、百家说。历史现象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之结果,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都具有一定价值,能够在某些细节方面廓清了苏东剧变的原因。但是,越是碎片化、精细化的原因分析,越会呈现出盲人摸象的局面,致使苏共亡党的原因虚化、淡化。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接续相连,前后贯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就已经逻辑地蕴涵了某一问题发生的线索和原因。这就需要在分析社会问题之时具有历史感,把某一时代的问题与它前面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企图超越某一个特定时代、某一特定文化社会规范来考察历史的意识。”<sup>[27]</sup>这种意识在分析苏共亡党缘由之时,仍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从整个历史过程中找寻线索和原因,从苏共起初执政的时期开始梳理。本文在阐释列宁关于避免执政危险的思想之时,也有意识地串联了苏共后来的解体的事实,力求从列宁思想和起初的逻辑中找出苏共解体的缘由。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断定,列宁在当时所窥探出的一系列执政危险,苏共后来几乎都遇到了,但后继者并没有像列宁所强调的那样去应对,最终导致了执政地位的丧失。苏共亡党也从反面展现出列宁关于避免执政危险思想的深邃性与前瞻性。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列宁的那个时代相比,尽管世情、国情、党情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依旧面临着列宁当时所担忧的执政危险。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防范急躁冒进危险,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和道路充满信心,对各种干扰因素要有战略定力,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我们同时也要避免党员腐化变质成为与民争利的群体,必须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时代变革之中,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各类矛盾凸显,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挑战,党要不断着力自身能力的建设,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建设,更好地引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国也是有着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政治领域的圈子文化、人情文化、官本位思想就是封建落后文化残余的反映。落后的文化因素深入到文化心理与生活伦理之中,让人习

焉不察,难以清除。我们必须不断地坚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通过久久为功的理想信念教育抵御住日常生活中的落后文化心理的侵袭,保持共产党员积极昂扬的斗志与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返本是为了开新,是为了找到最初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行。列宁关于避免执政危险的思想揭示了落后国家执政的基本规律,涉及到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若干问题。回顾和重温列宁的关于避免执政危险的思想,就是要体悟列宁身上所具有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理解列宁在应对执政危险过程中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更好地破解我们党所面临的现实危险,探寻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的执政安全。

### 参考文献:

- [1]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杨承训,南俊英,车有道. 历史性的飞跃:列宁后期思想探索(1917-1923)[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20.
- [3] 列宁. 列宁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9.
- [5] 列宁. 列宁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64.
- [6] 韦定广. 列宁文化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83.
- [7] 列宁. 列宁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8] 萧功秦. 激进改革路径的苦果:苏联改革失败二十年后的反思[J]. 社会观察,2011(7):12-14.
- [9]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1914-1991年:上[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87.
- [10] 列宁. 列宁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8.
- [11]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55.
- [12] 周义程. 从分权制衡到社会制约:西方权力制约思想的范式转换[J]. 社会主义研究,2011(4):82-87.
- [13] 列宁. 列宁全集:第4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4] 查特吉. 关注底层[J]. 读书,2001(8):13-20.
- [15] 列宁. 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1-272.
- [16] 郑志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根据地对健康权的保护[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8):105-110.
- [17] 陈之骅.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主要问题和历史教训[J]. 东欧中亚研究,1998(6):3-14.
- [18] 王长江,姜跃. 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88.
- [19] 列宁. 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0-171.
- [20] 列宁. 列宁全集:第4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1]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4.
- [22] 列宁. 列宁全集:第5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0.
- [23] 列宁.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7.
- [24] 金雁.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16-25.
- [25] 李宗禹.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38-139.
- [26] 曼纽尔·卡斯特. 千年终结[M]. 夏铸九,黄慧琦,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9.
- [27] 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

责任编辑:黄声波